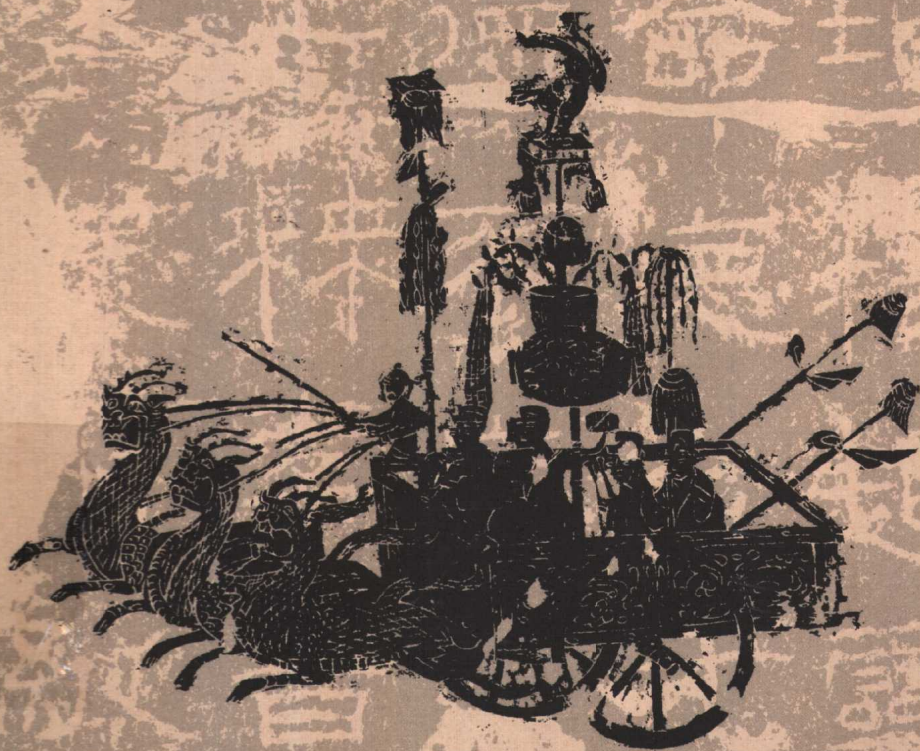




◇ 何丹 方柯 编著

汉语文化学



浙江大學出版社



◇ 何丹 方柯 编著

汉语文化学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文化学 / 何丹, 方柯编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 12

ISBN 7-308-03513-1

I. 汉... II. ①何... ②方... III. 汉语—文化—研究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8745 号

责任编辑: 周奕青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30 千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书 号: ISBN 7-308-03513-1/H·246

定 价: 12.00 元

序：琮台寻根

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我们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沿着灵峰山下的花径，我们欣然步入浙江大学玉泉校园，一座特殊的建筑——琮台，迎面屹立，引动了我们悠长的思绪和如同长江般滚滚而来的胸潮。琮台坐北朝南，其正面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与玉泉校区内的主道——求是路遥相垂直，其他三面矗立着现代化的教学大楼。人们从玉泉校区的中心大道北转，远远就可以望见簇拥于现代化的楼群之中的琮台古朴的轮廓和鼎立于琮台基座之上的三座多节琮高耸的群影。走近后又会发现，在多节琮的中心，静静地坐落着良渚文化的典型象征——方琮。方琮内圆外方，其四个平面和转角都雕刻着被称为“神徽”的饕餮纹——上下双脸，四目圆瞪。琮台高不过 5 米，广不过 13 平方米。它的基座，由普通的岩石砌就，基座上所有的雕刻，也由普通的岩石雕成。整座琮台，璞玉浑金，散放着远古文明的朴野气息，与整个教学区宏伟、壮观的现代风格相映成趣，又相得益彰。

这座琮台，建于浙江大学百年诞辰之际，其主体——琮，也被选中作为纪念浙江大学百年诞辰的徽章上的纪念图案。

琮本身代表什么？琮上的“神徽”又代表着什么？浙江大学为什么要于百年校庆之际建立这样一座琮台？让我们走近这坐落于现代名校现代化建筑林立的校园中心，散发着远古文明的、朴素的建筑，侧耳倾听，听听它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琮是良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质礼器，最早流行于距今约 5000~4000 年左右的中国东南地区——史前的长江下游文化区。

琮的构造特点是内圆外方。“方属地，圜属天，天圜地方”，所以，华裔美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琮是中国上古时代的“神巫”们“通天地”的工具。

在中国古文字中，“巫”作形，像两个“工”以直角重叠。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工”字条曰：“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与‘巫’同意。”“巨”（矩）字条曰：“巨，规巨（矩）也，从‘工’，象手持之。”金文中巨（矩）确作手持工形。这说明工与巨都是根据一种原始的工具（矩）而造的象形字。《周髀算经》曰：“数之法出于圜方，圜出于方，方出于矩……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圜，合矩以为方。”这段话说明了矩在古人数理观念中的地位。而由两个“工”以直角重叠而成的“巫”，指的就是执掌“巨（矩）”这种工具的人。和“巫”字结构最相近的，有“癸”字其形作，只和“巫”字方向略有不同。“癸”可读为“揆”，有度量之义，能作为“巫”字构形的分证。可以想像，在那个时代，矩这种多功能的工具的创造，应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大事，而能掌握这种工具的人，也必然被认为是具有了不起能力的人。在神灵观念盛行的上古时代，巫的这种能力自然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中国古代流行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与这种工具所具有的兼画方圆功能自然契合，使巫的身份从具有“画方圆”之类能力的能工巧匠，转化为“通天人之际”的准神职人员，而矩也从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工具，演化为象征性的礼器——内圆外方的琮。

今天的考古成果已证实，巫在中国上古时代非常活跃，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其范围包括了今天的工科、理科和文科。例如，根据中国文字学家唐兰先生的研究，中国的“八卦”是用算筹来布爻进行推算，这种方法就是由巫发明的。古文“学”字，像孩子两手布爻的形状。而“教”字的构形——“学”字旁加上一只执着带杈的竹枝（类似后来的教鞭）的手——也出于同一原理。所以，巫也是中国原始数学和教育学的开创者……可以这样说，巫是中国原始时期一切“学科”开创和研究的先驱群体，他们的工作，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当然，在那笃信万物有灵的原始时代，这一切都披上了神话和神灵的外衣。

今天的考古成果告诉我们，琮上的符号——神徽，是龙的图腾。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而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的研究，使这一观点逐渐为学界所

接受。李学勤先生等的研究还说明，中国文化、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字，追根溯源，都可追溯到良渚文化玉器、玉器上的图纹和符号。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着一个著名的“问鼎”的故事：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向王孙满问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这段话里最重要的有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要“铸鼎”？其二，所“象”为何“物”？为什么要“象物”？

关于第一个问题，考古研究已提供了答案：早在距今六七千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时期，鼎——一种与三角支架联体的锅子，已自东而西逐步演化成为华夏先民通用的食器。“民以食为天”，食器的共同性，揭示了华夏先民生存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共同性。到距今四五千年之际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形成“九州”格局，并产生了凌驾于众州之上的政治集团。到龙山文化末期，也即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诞生前夕，一场滔天洪水使华夏先民由“万国”而“一体”，而鼎也同步升华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所“象”为何“物”？为什么要“象物”？今天的考古成果也已提供了答案：从夏、商、周三代的国家重器——青铜器上的图纹来看，三代礼器上所铸的类似良渚文化玉器上“神徽”（商周时期被称之为“饕餮纹”或“兽面纹”）的图纹，应是龙的图腾。中国史前时代各个遗址出土的龙的图纹已证实了这一结论的可靠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其他民族的传说中也大多有过一场致命的洪水。不过，他们的传说大致都是这样的格局：洪水之后，只幸存下一对夫妇，后来，逐步繁衍成一个民族。而中国的传说则与众不同：当洪水铺天盖地而来之时，华夏先民们不是被动地任洪水洗劫，而是主动地联合起来，在杰出的治水英雄——禹的率领下，九州同心，用集体的力量战胜了洪水。同时，华夏的“万国”“九州”，在治水的过程中，自身也融合为“一体”。这样，治水胜利之后的合九州之“金”而铸鼎之举，显然具有了华夏合一之象征意义。从而，合九州之“金”所铸成之

“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华民族象征国家意义的“重器”。“龙生九种，种种各别”，合九州之龙而铸于鼎，代表着华夏先民民族统一的愿望，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正是这种追求统一的民族心理和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支持着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创造了与西方“破裂型”文化截然不同的“连续型”华夏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发展史中的奇迹。

回首一个世纪前，在中华民族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的时刻，华夏文化的历史也面临着重大的检验。一个重大的问题，时时困扰着“龙的传人”：

中华文明是独立产生的吗？

华夏文化的历史究竟有多久远？

“文化”一词——作为考古学的术语——乃“指某个时期、某一分布地域而具有明显特征的一群遗迹和遗物共同体的总称”。地球上从人类开始出现，就会留下遗迹和遗物，这些遗迹和遗物共同体都可叫作考古文化。而“文明”一词，则指当人类的经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进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它不是与人类同时出现的，而是人类文化演进到高级阶段才产生的。

什么样的文化才称得上是文明呢？这是多年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共同讨论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完全一致的认识。19世纪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肯定了摩尔根的分期法，恩格斯曾把人类的文明史称之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把“成文史以前”的历史称为“人类的史前史”。

从文献记录来看，中国的古文明，由五帝时代起源，至夏、商、周三代已趋于成熟。夏、商、周三代，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上有相当的延续性。如商对于夏朝政治的态度，在《史记·殷本纪》中有载：“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夏本纪》也记：“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又如周对于商朝政治，《逸周书·作雒解》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

《尚书·多士》载：“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至于文化上的三代继承，则更明显。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又说：“周监于二代（引者按：指夏、商两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然而，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疑古学派提出了疑古的主张。1922年，顾颉刚先生在整理上古史的过程中，把《诗》、《书》和《论语》三部书中所载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并加以比较，提出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也就是说，古籍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而造成的，神话传说发生的时代，其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排列系统恰恰相反：这便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史学界影响颇大的顾颉刚的学术精髓——“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同时，他根据《说文》中有曰“禹字训为虫”，便以为禹不是人类，而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一条虫。

当时史学界的普遍意见似有利于顾氏。可是，也有不少学者不同意疑古学派的极端看法。刘掞黎、胡堇人、柳诒徵等学者，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对顾氏的观点进行了发难和尖锐的批判。例如，胡堇人在其所撰《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中指出：“我以为古史虽然庞杂，但只限在尧、舜以前。若尧舜之后的史料，似乎比较稍近事实。”文中，胡堇人重点驳斥了顾颉刚关于禹不是人而是一条虫的说法。认为顾说是“望文生义”的解释：“若依这个例子，则舜字本义《说文》训作蔓草，难道帝舜就是一种植物吗？”

徐旭生也是不同意疑古学派的极端看法的。他指出：“极端疑古学派的工作人对于载籍湮灭极多的时代，广泛地使用默证，他们看见了不合他们意见的论证，并不能常常地审慎处理，有不少次悍然决然宣布反对论证的伪造，可是他们的理由是脆弱的，不能成立的。比方说，禹治水的传说，尧、舜、禹三人相互的关系，在先秦诸子中，可以说大致是相同的，没有争论的；而疑古学派的极端派和夸张它们的歧

异、矛盾,对于很多没有争论的点却熟视无睹,不屑注意。”他认为:“《尧典》、《皋陶谟》、《禹贡》诸篇《尚书》,固然非当日的或离当日不远的著作,是由于后人的追记,篇首‘曰若稽古’四个字已经可以证明;但是他们的记录未必无根据,记录的时期最早也可以溯到商朝。”后来,由于殷墟的全面发掘,商王朝终于被承认。然而,史学界争论颇为激烈的夏王朝,当时在考古学上仍处于空白和模糊阶段。要找出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只读古代文献记载显然是办不到的,这个问题要靠考古学来研究解决。

徐旭生认为,文献中关于夏人活动区域的传说,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材料。这些材料指明下列两个地区和夏的关系特别密切,也就是说,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应分布在晋南平原,汾、浍、涑水流域,洛阳平原,伊、洛、颍水流域,以及关中平原。

1959年春夏之交,已是72岁高龄的徐旭生不顾年老体衰,带着助手亲赴豫西对文献记载中的“夏墟”展开调查,从而揭开了实质性田野探索夏文化的序幕。一日,当他途经偃师县境内,准备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考古工作站落脚时,来到洛河边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外。徐旭生先生发现此处有些异常,便停下来四处转悠,以寻找心目中的东西。当他在村外转了半圈后,有一个正在田地里劳动的农民感到很奇怪,心想这个外地老头一定是丢失了什么,便主动向前询问。这一问把徐旭生问乐了,他幽默地说:“丢了一件大东西,是一座城,几千年前的一座城。”这位农民不解,徐旭生解释说:“我是搞考古调查的,想在这一带看看有没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么的。”这位农民听罢,不以为然地说:“陶片,我们这里多的是呢,还有完整的陶罐、陶盆,都是搞水利建设挖出来的。”当徐旭生等人来到二里头村外时,当地农民仍在田野里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他们一行人来到农民们正在挖掘的一个水塘边,发现遍地都是挖出的陶片,待他们进入水塘的台阶,又看到塘壁上布满了陶器的碎片,用手轻轻一摸,这些碎陶片便“哗啦、哗啦”地四散跌落下来。

这里就是本来意义的中国。它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城西南约9公

里处，西近洛阳城。就其位置而言，它南临古洛河及伊河而望嵩岳、太室、少室山，北依邙山而背黄河，东有成皋之险，西有降谷崤函之固。其所处的河洛地带自古被称为中土、土中、地中，并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和“万方辐辏”之誉。传说自伏羲至周成王各代圣王皆在河洛地带膺图受瑞，并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由于武王曾在此处廷告于天下：“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因而这里也是本来意义的中国。后来周公遵武王旨意在此营建洛邑作成王之都。此外，周公还在嵩山附近兴建测景（影）台，从礼制上确定此地为天下之“地中”，并赋予“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等神秘意义。汉魏以后亦有不少王朝留意于此，在此建都。这里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和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区。发掘不几天，考古人员就发现了一处宫殿基址。考古人员结合此前在四周发现的相当数量的房基、窖穴、灰坑、水井、窑址以及铸铜陶范、石料、骨料等遗迹、遗物推断，二里头遗址确实具有古代早期都邑的规模。

此后，在为期 40 年的时间里，在赵芝荃、方酉生、殷玮璋、郑振香、高天麟、郑光、杜金鹏、张立东等几十位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下，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揭示出来。“所知范围总面积约 3 平方公里，文化堆积甚厚，内涵十分丰富”。遗址的文化延续时间经历了相当长的岁月，粗略估计前后约 400 多年。就具体内容而言，文化遗迹中有大、中、小型各类建筑遗址，其中有宫殿、陵寝、台坛、祭祀性设施、各阶层的居室以及手工业，如铸铜、制骨等作坊，此外还有陶窑、水井、道路、灰坑、墓葬等。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在遗址中部发现的被称为第一、二号两座宫殿基址，规模宏伟、气势壮观，颇有王者气象。第一号宫殿面积达 1 万多平方米，其周围有回廊，而东、南、北三面则为复廊，南部有三个门道的庑式大门，院内北部是 30.4 米×11.4 米的大殿台基。第二号宫殿的大殿略大于一号宫殿，殿后有一大墓。从性质上推断，这个宫殿当属宗庙、陵寝之类。就整个第一、二号宫殿的气势和规模而言，在整个商代考古史上罕有其匹敌者，“其平面安排开

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仅从台基的面积来看，甚至可以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匹敌。如此规模庞大的宫殿基址，考古学家前后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才使其完整地重见天日。后经研究者推断，这两座宫殿都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在这一时期中，二里头文化进入了它最繁荣、辉煌的鼎盛时代。也就在这个非凡时代的遗存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铜器和陶器。其玉器多为圭、璋、戈等礼器，这些礼器在整个玉器和礼器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开拓作用。而出土的青铜容器和武器的形状之独特，皆为中国之首次发现，尤其是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种类繁多，其选料之精、制作技术之高超、纹饰之精美，在整个商代考古史上从未有其先例，堪称国之重宝。

1962年，考古学大师夏鼐把此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之后又根据新的发掘进展，将这一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大约40年后，“夏、商、周断代工程”终于把这里确定为夏文化遗址。

同时，“夏、商、周断代工程”还完成了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起讫年代的考证，确定：公元前2070年为夏朝始年；公元前1600年为商朝始年；公元前1046年为周朝始年。

夏鼐先生曾指出：“我们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夏、商、周）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郑州二里冈文化，和比这更为古老的偃师二里头文化。从新发现的文化内容上，我们可以证明它们之间是有互相联系、一脉相承的关系。”

中华5000年文明终于得以确立。

综合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华夏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沿着向心凝聚式的轨道发展的历史：从传说中大禹治水时的“万国”（古国），

到商汤伐桀时的 1300 余国(方国),到周武王伐纣时的“八百诸侯”,及之后分封的 71 国,乃至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最后到秦汉的中央集权的帝国,终于实现了华夏民族大统一。从这一过程来看,中国大地上的竞争,与从西亚到欧洲的竞争类型不同,是一种非取代式的竞争,一种在竞争中互相学习、逐步同化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造成了类似滚雪球那样的效应:一方面,其核心部分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其外围越来越大,从中原扩大到了“四夷”,形成了辐射式的诸多层级而同一中心的实体。这样的发展历史,造就了华夏文化向心凝聚式的特质,也形成了中华民族注重民族团结、要求民族统一的传统和心理。

今天,世界已进入 21 世纪,中国已进入科学高度发达的电脑时代。数千年前流行的琮及琮的原型——矩,就其本身而言,早已成为历史,但就其代表的民族创业精神而言,则永远不会过时。今天在浙江大学校园中心屹立着的琮台,是华夏先人筚路蓝缕的开拓历史和向心凝聚的发展历史的见证,也是华夏民族特有的团结奋斗的传统象征。它提醒我们: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无论我们今天具体所从事的是工科、理科,还是文科的学习或研究,都要继承和发扬华夏民族开拓期的先驱们那种勇于创新、勤于奋斗、不断探索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使中华民族再次跻身于世界强者之列,使中国龙时时腾飞于人类竞争之大舞台之上。

作者

2003 年 8 月

目 录

第一单元 汉语、汉字、汉文化的特性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语言、文化和语言文化学	1
第二节 汉语、汉字与汉文化的类型特质	7
第三节 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蕴涵的多层华夏历史文化信息	13

第二单元 中国神话传说与中国考古文化

第二章 铸鼎·象物·中国龙文化	19
第一节 饕餮纹及其演变之轨迹	19
第二节 中国史前文化遗址中的龙文化投影	25
第三节 铸鼎·象物·龙文化的实证性	28
第四节 考古、气象与龙的生物学原型新证	37
第五节 龙形象的神化、哲学化与“跨学科”化	42
第三章 中国凤文化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48
第一节 “风鸟”与“凤”——从《诗经·关雎》说起	48
第二节 “凤鸣岐山”的传说与周原祀凤卜辞	51
第三节 青铜器纹饰中的“凤纹时代”	54
第四节 殷人先祖与“风鸟王朝”	60
第五节 “帝史凤”与周人的天命观	66
第六节 政权的更替与文化形态的连续 ——《诗经·关雎》之“化南”功能浅析	73

第四章 龟灵、八卦与汉字的滥觞	80
第一节 “龟负图”的传说与考古发现的玉龟、玉版	80
第二节 太极、两仪、四象、四方与天圆地方的观念	82
第三节 “龟灵之歌”——汉字起源交响乐中的主旋律	85
第五章 西南少数民族的虎文化	92
第一节 西南少数民族的虎崇拜	92
第二节 “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	101
第三节 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研究在文字类型学上的重大意义	107

第三单元 自然科学的突破与语言学理论的飞跃

第六章 “语言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普通语言学的诞生	114
第一节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	114
第二节 语言宏观分类述要	116
第三节 语言微观分类述要	123
第七章 回顾 19 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施莱歇尔的“谱系树”理论	126
第一节 施莱歇尔及其谱系树理论	126
第二节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	129
第三节 语言地理类型学及其他	131
第八章 20 世纪普通文字学研究领域的建树与缺失	135
第一节 美国语言学的开创与“布龙菲尔德时代”的形成	135
第二节 格尔伯模式及其晕轮效应	141
第三节 白瑟拉脱的突破与普通文字学原则的回归	143
第九章 21 世纪的新达尔文进化论与语言—文字类型学新说	152
第一节 达尔文的局限与生命科学的新突破	152

第二节 语言学的实验与语言—文字类型学的实证·····	154
第三节 试论语言基本类型与文字基本类型的内在关联与 制约机制·····	163
第十章 人类语言双螺旋结构系统中的“汉语端”·····	176
第一节 现代汉语共同语·····	176
第二节 现代汉语的地域分支——方言·····	178
第三节 汉字的产生与发展图示·····	179
第四节 汉字字体的演变·····	188

第四单元 汉语的自然音步与周唐诗国文化

第十一章 三代文化与“《诗》体”的起源·····	194
第一节 “雅乐”溯踪·····	194
第二节 田野农业与古国文明·····	197
第三节 周代田亩制度与灌溉系统·····	199
第四节 周耜略论·····	201
第五节 三代耦耕渊源与周代的耦耕制度·····	205
第六节 井田制的创立与“《诗》体”的起源·····	209
第十二章 “诗”在周代礼制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功能·····	214
第一节 “诗”的社交语言地位·····	214
第二节 “诗”与“礼”·····	219
第三节 用“诗”的技巧——“断章引义”·····	224
第四节 周代教育制度与“诗”的学习、传授和运用 ·····	225
第十三章 汉语的自然音步与唐代的诗歌格律 ——试探汉语类型、汉语节奏和汉语艺术之间的内在联系 ·····	229
第一节 中国古代韵文述要·····	229
第二节 唐代近体诗格律浅谈·····	232
第三节 汉语的自然音步与古诗格律的内在联系·····	236
主要参考文献·····	242

第一单元 汉语、汉字、汉文化的特性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语言、文化和语言文化学

一、语 言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能指是能为人们以某种方式感知得到的外在形式,所指是符号形式所表示的意义或内容。能指和所指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就如纸的正面和反面一样。能指和所指既无相似之处,又无相关之点。人们看到照片就联想到照片中的人物,这是因为相似而产生的联想,当然不属符号。听到雷声就想到闪电,这是因为相关而产生的联想,也不属符号。能指和所指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约定的关系。约定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约定,一种是社会约定。前者如猎人打猎时做的只有他自己能懂的记号,后者如现代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个人约定可以更改,而社会约定一旦成立,就不能随意改变。语言符号的能指是语音,所指是语义。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系统有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由多个基本单位组成;第二,这些基本单位不是一盘散沙,而是相互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语言是一个系统,一个复杂的系统,一个开放的系统。

任意性是符号的第一原则,也是语言这一符号系统的第一原则。语言的任意性,有两层意义:第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在其原生层面上的结合,只是一种社会的公共约定,而并非出于两者内在的联系;第二,一旦约定,就不能因个人的意志而更改。

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语言包括表情语、姿势语,甚至红绿灯在内,泛指人类一切符号系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广义的语言,大致与当代的社会—文化学重合。

狭义的语言单指有声语言系统。它以语音为能指,以语义为所指。

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狭义的语言。

文字也是一种符号系统。

文字的能指是书面形体,所指是语言。

文字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字与广义的语言相对应;狭义的文字与狭义的语言相对应。

文字是一种以语言为基座的次生层符号系统。文字学一般归属于语言学的范畴。然而,文字不是语言的影子——立足于普通语言学的高度来看,文字自身也是一种独立的符号系统。

语言是听觉符号系统,文字是视觉符号系统。

语音是语言与文字惟一的联系纽带。

文字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扩大了语言的交际功能,弥补了语言这一听觉符号系统在人类交际时空范围方面的先天不足,使人类文化得以代代相传。因而,文字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语言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不但决定了语言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系统,而且还决定了语言学是一门特殊的、兼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性学科。

因而,语言学向来是一门领先的学科。